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把握新大众文艺“新”在何处

□ 范玉刚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日益活跃,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大量自主表达自身生活、多元化情绪体验,展示个体多彩生活,展现社会万千气象与新时代风貌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当前,新大众文艺发展如火如荼,已成为社会与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现象之一。尽管新大众文艺命名与流行已有一段时间,但其深入发展势头依然猛烈,所产生的强大裹挟效应与对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促进作用依然强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文艺到底“新”在哪里?为何能够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如何更好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表征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文艺源于生活,是在生活的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在当下的中华大地上,一场由普通人主导的新大众文艺风潮正劲。这些基层民众用笔、相机、手机,或写作,或拍摄,发出劳动者的声音,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海量基层民众得以参与共创共享,“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评论者”逐渐成为现实。无数普通大众携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自主站上文艺的前台,应运而生的新大众文艺,其蓬勃兴盛的景象折射出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

作为映照文化强国建设的镜像,新大众文艺里有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有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有大众眼中五光十色的时代场景;作为展现时代精神的载体,新大众文艺在风潮正劲中迸发出感召人心的力量,引发了大众的共情共鸣。不同于此前面向大众的代言之作,互联网方便了普通劳动者进行文艺的自主表达,这种与自己生活“直连”的方式,使文艺创作更加自然,生动诠释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可见,新大众文艺既非精英文化的下沉,也非流行的大众文化的复制粘贴,更不是传统大众文艺的代言性创作,而是数智时代的文艺新业态与文化新形态,在蓬勃兴盛中有其独特的旨趣与鲜明特征,是新时代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强势迸发的表征。

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新大众”正崛起为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主体。这意味着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从少数文化精英扩展至遍布社会各领域的基层民众,形成了一股新的文艺文化主体力量。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民众,“新大众”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层民众,并非把大众与人民割裂与对立起来,而是将传统政治中心话语中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即新时代的人民群众。新大众的内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贵”的价值底蕴,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也充分借鉴和汲取了作为现代文明对公民个体的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有着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的文艺新话语,“新大众”借由数字化大众传播,讲述自己的故事。一定意义上,“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决定性要素与根本性特征,正是规模庞大的文艺人群筑牢了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社会基础。也

理解新大众文艺的三个角度

新大众文艺之“新”,首要体现为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主体之“新”。

作为广泛意义上的民众,“新大众”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层民众,并非把大众与人民割裂与对立起来,而是将传统政治中心话语中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即新时代的人民群众。新大众的内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贵”的价值底蕴,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也充分借鉴和汲取了作为现代文明对公民个体的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有着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的文艺新话语,“新大众”借由数字化大众传播,讲述自己的故事。一定意义上,“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决定性要素与根本性特征,正是规模庞大的文艺人群筑牢了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社会基础。也

作为广泛意义上的民众,“新大众”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层民众,并非把大众与人民割裂与对立起来,而是将传统政治中心话语中抽象的“人民”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即新时代的人民群众。新大众的内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贵”的价值底蕴,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也充分借鉴和汲取了作为现代文明对公民个体的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有着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的文艺新话语,“新大众”借由数字化大众传播,讲述自己的故事。一定意义上,“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决定性要素与根本性特征,正是规模庞大的文艺人群筑牢了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社会基础。也

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性有了新的意味:无数个个体在文化上立起来,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主体性。在崛起的新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中,没有什么草根与素人,他们就是鲜活真实的,能够在文化上立起来的普通民众,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所依托的文化脊梁。新大众的崛起,使新大众文艺夯实了文艺发展的人民立场。

毫无疑问,数智技术赋能是新大众文艺崛起的前提条件。数智技术的应用使“新大众”作为创作主体这一决定性要素和本质性力量凸显出来。可以说,正是在技术加持下崛起的新大众,构成了文艺创作生产的多元化主体,确证了文艺创作生产主体的历史地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取向,然而,尽管新技术新媒体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关键性要素和重要驱动力,但不是决定性要素和本质性力量。新大众作为文艺创作生产的新主体,才是新大众文艺的根本性、决定性要素。新大众文艺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主表达,呼应了面向大众、为大众创作的“人民文艺”,是在贯通人民性价值基础上对“人民文艺”的衔接、补充、丰富和发展,共同培育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形态。因此,新大众的崛起不是要取代或否定传统文艺精英的地位和价值,而是作为文艺生力军回应时代对文艺发展的新要求,是对“人民文艺”的补充与丰富,并从根本上推动自身促进了“人民文艺”的转型升级,是文艺发展向自身生活的回归,是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下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人民大众文化主体地位确立的表征。

其次,新大众文艺之“新”,还鲜明体现在数智技术赋能下的文艺新载体与新传播。

数智技术赋能是形成新大众文艺的新载体与新传播的鲜明特征的基本条件,但并不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明特征。数智技术应用是时代特征,重构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肌理,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基本条件,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支撑。数智技术应用与文艺结缘,助力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

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文化生产的现实境况来看,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其迅猛崛起的强大助力外因,构成了其文艺形态跨界交融态势,形成了新大众文艺鲜明特征的大众化传播效应。从艺术形态上看,借势信息化技术应用,不只文学创作,各门类艺术都在信息化技术应用中得以革新,不仅以文字类为代表的文艺形态获得广泛性传播,直播、短视频、微电影等新形态也不断涌现,使传统艺术形态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艺术传播力与审美表达力。一方面,新大众文艺出现泛文本化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作引发了文艺“智能时代”的新变。但是,数智技术应用之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是根本性的决定要素,只是在技术应用赋能下使文艺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数智技术赋能使新大众文艺的载体与传播方式迥异于传统文艺形态,有了“新”的意味——新载体与新传播,进而造就了新大众文艺鲜明的广泛性、传播性特征。大众性表现为新大众文艺覆盖的广泛性,传播性表现为新大众文艺瞬间触达的即时性,这是新大众文艺不断“破圈”“出圈”的关键。

新大众文艺之“新”,还表现为一种自然独特的新话语。

从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话语表达来看,新大众文艺有着鲜明的“我手写我口”的意味,其话语表达的劳动者本色,使其有别于精英文艺与面向大众创作的“代言者”的话语特征。例如,就新大众文艺的诗歌形态来讲,无论是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歌,还是“沂蒙二姐”吕玉霞的诗歌,或是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无不带有浓厚的“第一现场”的体温与驳杂的生活色彩。诗歌文字背后的从容闲适心态,自然朴素如同日常对话,令人自然生发出“生活就是艺术,艺术

就是生活”的审美感知,但这并不削弱其诗歌语言的“硬度”与情感的饱满,反而熔铸了一种久违的文艺应有的钙质。文艺因此变得有力量,能够打动人心,而不再是茶余饭后的点缀或抽象的话语修辞,这是其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性所在。

从总体上看,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时代的变化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出场的历史机缘,彰显了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信,是信息技术应用、大众文化权益保障与文化惠民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新大众的兴起、新文艺业态的涌现,造就一次次“破圈”“出圈”的爆款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生动诠释了“文艺就是生活,文艺就是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从更宏大的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十余年来文艺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收获。新大众、新载体、新传播、新话语,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关键词。

汇集“众创”“众智”形成“众能”

经由对新大众文艺之“新”的关键词阐释,可以看出新大众文艺的边界是流动的,其文化场域不是固定僵化的,但也不能任意地扩大其边界而涵盖几乎所有的文艺,尤其不能以数智技术应用来作为区分标准。基于此,有必要从相对狭义的视角来把握。在我们看来,所谓“新”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上,“新大众文艺”是一个非常具有涵盖性的分层概念,是一个具有价值辐射力、场域裹挟性的概念,有着多样化形态,有多个来源,有主导形态、边缘形态和相关形态。其中,新大众、新载体、新话语、新传播,是理解和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由此带来了价值取向、审美范式的转换。可以将其定义为:新大众文艺主要是指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基层民众,借势数智技术应用以多样化方式和传播手段,进行文化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并在大众化传播中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

究其实质,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如火如荼,既是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结果,也正在构成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新机制。那么,如何更好地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一方面,在深入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时代语境下,要不断提高文化新基建的水平,在数智平台上汇集大众智慧和才能,同时继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和服务效能,为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筑牢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回到文化本体即回到人这个根本点,契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的新理念,不断提高人的现代观念意识与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不断提高新崛起大众的文化素养与文艺修养,使文艺发展的重心落到以文化人、文德教化和以美育人上,以每一个个体的素养提升,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使全社会更好地迸发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面对全社会蓬勃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需要在创意与发展方向上加以价值引领,使之坚定地行走在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上,从而切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其引领重心应落在“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上。也就是说,在国家文化发展顶层设计中引领新大众文艺,必须在尊重人民大众的需求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中,汇集“众创”“众智”形成“众能”,以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彰显人民的文化自主表达权益,进而高扬文艺的人民性旗帜,使其高高飘扬在新时代文化创造活力不断迸发的沃土上,在变动不居中营造良好的文艺生态。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文旅融合的价值在于旅游体验

的文化特质及深层次文化内涵的呈现,不是文化和旅游业的简单相加,需要警惕重消费轻体验、重眼前轻长远、重都市轻乡土的误区

文旅深度融合要警惕三个误区

□ 刘鹏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制定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全业态发展文旅产业,持续打响“好客山东”品牌,打造国际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旅游强省。随着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文化因素在旅游链条中正日益凸显其价值,游客在消费体验过程中实现文化共鸣和情感互动。

文旅融合的价值在于旅游体验的文化特质及深层次文化内涵的呈现,不是文化和旅游业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互交融,环环相扣,把文化底蕴、旅游体验、商业价值和人文情怀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其核心诉求是通过文化赋能和场景营造,从物理空间的简单呈现升级为文化、情感、体验的有机融合,满足消费端从物质到精神的需求升级。

现阶段各地文旅融合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人文经济学视角来看,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误区。

一是重消费轻体验,导致文化价值缺失。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关注各地的文化之美和生活之美,情感体验大于欣赏风景。一些传统景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模式,开发过度商业化,注重资源的展示,却忽略了文化的共情,未能同步提升游客消费感受和文体验。有的古镇历史街区改造,新建“老街”上都是外地的小吃招牌,本地的特色商品却难觅踪影,丢失了当地的文化韵味。有的项目披着文旅的外衣大行商业地产项目开发,文旅的“文”成了点缀,文化被商业稀释。这些文旅不协调发展的模式因其忽略了人文价值,对游客而言也就失去了文化上的吸引力。

二是重眼前轻长远,使得发展不可持续。人文经济学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反对短期功利行为。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文旅融合,注重的是单一景区的一次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文化认同和情感互通构建复合型消费模式。有的景区近年来多次提高门票价格,短期看,景区收入确实有所提高,但这种短视行为很快带来负面影响,游客面对高昂的门票价格选择用脚投票,过而不入。这种短期功利行为牺牲了长期竞争力,导致文旅融合陷入困境。

三是重都市轻乡土,造成城乡文旅发展差距。文旅融合对软硬件环境有一定要求,客观上造成高端项目在市区及周边扎堆。人流聚集、交通便利、投资回报率高等往往是城市文旅项目成功落地的先决条件。一些农村地区因滞后的基础设施,守着丰富的文旅资源,虽有发展的需求,往往陷入项目无门、找投资落空的困境。乡村有乡村的优势和特色,简单复制都市业态难以复制发展的成功。

人文经济学重视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兼顾人文与经济属性。文旅融合通过产业互通重构,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单一属性,构建了以人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产业链。当前,面对机遇和挑战,笔者结合相关成功案例,对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数字赋能,以游客精神需求为导向,让文化活起来,实现场景体验与旅游消费的双赢。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可以互联互通,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必然带来文旅融合的深度融合。例如,泰山景区创新推出“登山助力机器人辅助装备”,提升了游客的登山体验;泉城济南构建以宋词为特色元素的多媒体沉浸式演艺乐园,深度融合济南地域特色和宋词文化,成为数字赋能文旅发展的典型案例。这些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人文价值赋能经济升级,有效拓展了文旅融合的新路径。

二是深耕在地文化,打造地方文化特色鲜明的文旅IP。文化是旅游项目的核心,重点不是简单的元素拼接,而是凸显当地文化的独有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旅复合价值载体。例如,济宁市作为运河之都,充分利用城区段京杭运河资源,利用数字技术打造运河风情观光带,开通夜游老运河项目,使游客在白天游完景区后,夜晚可以坐船从另一个视角观赏运河之美,拉长了文旅消费产业链,增强了游客体验感。淄博烧烤近年屡异军突起,当地以“小饼大葱自助烤”的独特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当地独具文化内涵的中国陶瓷琉璃博物馆也随之成为网红打卡地,大量游客在自媒体平台发布旅游视频,景区参观者变成文化推广者,形成动态双向交流模式。

三是文化下沉,推动城乡统筹,均衡发展。文化不是一部分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群共有共享的精神食粮。文旅融合不仅繁荣了城市经济,也必须惠及广大乡村。沂蒙红军旅游区结合抗战时期老区人民奋勇支前的红嫂事迹,打造红嫂纪念馆和红色影视基地,游客至此可了解红嫂群体英雄事迹,参观《沂蒙》《红高粱》《生万物》等影视剧拍摄现场,沉浸式参与《重走支前路》演出,深刻体会沂蒙精神的内涵,获得旅游体验和人文价值的双重收获。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土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拓展了旅游资源,同时也给当地农村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推动共同富裕。

当前,旅游已从传统的资源驱动,升级到现阶段的文化场景驱动和多业态深度融合;游客的消费行为已突破原来的物理空间游览,转为可沉浸可传播的文化场景体验。要结合当地实际,深度挖掘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项目落地,不搞强行嫁接,必须整合相关各领域资源,突破原有各自为政、各自发展的尴尬局面,构建综合各种积极要素、多元多维度发展的经济骨架。文化的价值在于引发人的情感共鸣,抓住游客的情绪需求,让游客在文化体验买单。“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旅融合切忌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无差别发展,要通过文化的“形”传递文化的“神”,让游客在旅游中获得文化体验,从而彰显人文经济学的价值。(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核心观点

●新大众文艺既非精英文化的下沉,也非流行的大众文化的粘贴复制,更不是传统大众文艺的代言性创作,而是数智时代的文艺新业态与文化新形态,在蓬勃兴盛中有其独特的旨趣与鲜明特征,是新时代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强势迸发的表征

●新大众文艺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主表达,呼应了面向大众、为大众创作的“人民文艺”,是在贯通人民性价值基础上对“人民文艺”的衔接、补充、丰富和发展,共同培育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形态



扫码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解读专题

人文经济大家谈

从词源透视“人文经济”的丰富意蕴

□ 孙彬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人文经济学”,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突破,标识性建构,为破解现代性困境、超越西方经济理论的局限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词源学角度考据源流,《周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人文”为经济发展划界定向,绝非简单的概念嫁接,而是对“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是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的战略抉择。这一论断既立足中华文脉的深厚土壤,又回应了现代经济发展的价值迷失,为全球发展治理贡献了东方智慧。而作为英语“economy”译名的“经济”一词,在中国古典语境中,乃“经世济民”之略,承载着“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语境中的“经济”概念,其内涵远超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对物质资料生产再生产过程的狭隘界定,始终内嵌着价值引领与人文关怀。今天“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传统基因的时代唤醒——将“经世济民”中的人文引领地位重新置于核心,纠正了西方经济学将人物化、将发展工具化的理论偏失,实现了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塑。

更进一步看,中国的“人文经济”绝非西方“人文产业”等概念的简单挪用或线性延伸。后者往往停留在“人文+经济”的物理性叠加,人文不过是经济的附属或装饰;而中国的“人文经济”则是深度融合,是以人文赋义,以人文定向,以人文铸核,以人文立标的发展新形态。在这里,人文不是发展的外在变量,而是内在规定;不是手段工具,而是价值本体。这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人文经济之要义,在于以人为本。这里的“人”绝非抽象而孤立的符号,而是人文经济的价值底色与动力源泉。“治国由常,而利民为本”,人文经济的一切发展,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一切建设的归宿,都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与价值旨归。人民群众用双手托举梦想,以汗水浇灌收获,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业绩。这正是人文经济最鲜活、最持久的力量之源。

中国“人文经济”的“人”发挥以下四方面作用。作为人文经济核心的“人”,其作用体现在引领方向、实践创造、惠及民生、实现价值等方面。理解人文经济,需把握这四者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中,人既是主导力量,也是实践主体,既是服务对象,也是终极目标。

首先,“人”是人文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语》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人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文经济的本质在于重新让人回归主体位置,人往往被降格为生产要素或消费符号;而人文经济则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从经济活动的客体提升为价值尺度,从被异化的工具还原为主导者本身。这种关系的根本转换,意味着人不再依附于资本逻辑,人的主动精神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外部变量,将发挥价值与方向的主导作用。

其次,“人”是人文经济的实践主体。《礼记》中有“人者,天地之心也”的说法,强调人作为天地规律之践行者的重要作用。人文经济之“人文”,在于对人在经济实践中主体地位的尊重。人是生产力的最活跃的因素,更是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与首要实践者,人文经济所要激活的,正是人作为劳动者、建设者与创造者的力量。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大会上,天安门广场上三“人”成“众”的观礼台整体布局成为了震撼众人的视觉符号,这一独特设计,象征个体汇聚成众人,众人筑就长城,也隐喻着我国经济的每一项发展成就的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在进行着具体的创造。

再次,“人”是人文经济的服务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人”是一个关键词,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还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举以及针对就业、收入、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部署,都凸显出发展的人民性底色。这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发展指向。人民福祉是检验发展成效的试金石,现代化须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由此,“人”只有成为人文经济的服务对象,人文经济才能打破资本积累的冰冷逻辑,真正温暖每一个具体的人。

最后,“人”是人文经济的终极目的。《淮南子》云“治国由常,而利民为本”。人文经济的一切发展,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人”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本身。这是人文经济区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基本标识。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绝非抽象的经济数字的增长,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这一辩证法则,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经济活动便获得了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意义。

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从“资本逻辑”到“人的逻辑”,这一范式的根本转换,标志着经济学向“人学”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经济已然升华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这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迷思的历史性超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